



中國古代文學

廣播講稿(2)

新疆廣播師範大學



中国古代文学

(汉魏六朝部分)

刘 兆 云

新疆广播师范大学

一九八〇年四月

说 明

本书是我校语文专修科“中国古代文学”讲座的广播稿。

“中国古代文学”讲座由新疆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讲师张庄、刘兆云、秦绍培、郝延霖四位同志撰稿并讲授。

本书共分四册。第一分册是先秦部分，第二分册是汉魏六朝部分，第三分册是唐宋部分，第四分册是元明清部分。

第二分册是刘兆云同志编写的。付印前，我们在文字上作了适当修改。

新疆广播师范大学语文教研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第一讲	两汉文学概况(一).....	(1)
第二讲	两汉文学概况(二).....	(8)
第三讲	汉乐府和《孔雀东南飞》.....	(16)
第四讲	贾谊和《论积贮疏》.....	(24)
第五讲	晁错和《论贵粟疏》.....	(32)
第六讲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40)
第七讲	《陈涉世家》讲解.....	(48)
第八讲	《鸿门宴》讲解.....	(56)
第九讲	《孙臧传》讲解.....	(64)
第十讲	《廉颇蔺相如列传》讲解.....	(72)
第十一讲	褚少孙与《西门豹治邺》.....	(80)
第十二讲	刘向和《叶公好龙》.....	(88)
第十三讲	王充和《论衡》 分析《订鬼》.....	(95)
第十四讲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上).....	(103)
第十五讲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下).....	(111)
第十六讲	曹操和《蒿里行》.....	(120)
第十七讲	王粲和《七哀诗》.....	(128)

第十八讲	陈寿《三国志》和《隆中对》.....	(136)
第十九讲	陶渊明和《桃花源记》.....	(144)
第二十讲	范晔和《后汉书》简介 分析 《张衡传》.....	(152)
第二十一讲	北朝乐府和《木兰诗》.....	(160)
第二十二讲	郦道元和《水经注》 分析《三峡》...	(168)

第一讲 两汉文学概况〈一〉

在讲两汉文学之前，首先说明一下为什么不讲秦代文学。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灭齐统一全国，到公元前二〇九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其间全国大致安定的时间只有十二年，即使算到公元前二〇六年秦朝灭亡，也只有十五年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造就一批作家，形成一代文学的特色是不容易办到的。秦统一全国后，废除了周朝的分封诸侯王的制度，改为实行郡县制；统一了度量衡单位和各种法令；改六国文字为统一使用的小篆和隶书。这些进步措施本来可能对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但是却被一系列错误的政策淹没了，不能发挥其促进作用。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过分征发劳役，如修长城、驰道、阿房宫、骊山墓等等，每项工程都动辄调用几十万人，长年累月，无休无止。大量的人力和物资被从农业生产上调走，就给经济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目前我国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骊山墓周围的秦代陶制兵马俑坑。从已经出土的实物看，那些数以万计的、真人般大小的手持真兵器的陶俑和真马一样大小的陶马，需要耗用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完成啊！

秦朝统治者对人民刑罚严酷，剥削惨重，实行高压政策。相应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严厉禁锢，实行愚民政策。秦丞相李斯就曾经提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

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时“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同上）据王充《论衡》中记载，仅这一次就杀儒生四百六十三人，加上咸阳以外各地所杀和其它各次所杀，被杀人数当远远超过此数。历史上称这种措施叫“焚书坑儒”。其法律上的名目分别叫做“挟书律”和“谣言诽谤罪”。在这种摧残学术文化的错误政策下，当然不可能产生重要的作家作品。勉强数得上的是李斯。他在秦统一全国后主要是写了一些刻在石碑上的歌功颂德的文字，如《泰山刻石文》、《琅琊台刻石文》以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地的刻石文。这些刻石文在当时也算一种应用文、继承了《诗经》中雅、颂的传统，用四字句，字义典雅，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的功德，在文学史上并不重要。秦代以后，历代撰写碑铭文字的作者沿袭了李斯刻石文的体例，这是它的一点影响。除此以外，秦代没什么作家作品好讲。

从公元前二〇六年起，随着秦朝的灭亡，开始了楚汉相争的局面，历时五年。到公元前二〇二年，汉高祖刘邦称帝，才统一全国，建立了汉朝。因为首都在长安，历史上称为西汉。

西汉初期，经济形势很坏。由于秦朝对经济的破坏，接着又是连年战乱，造成了《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那种田园荒芜。十室九空的景象。封建社会经济的支柱是农业，而农民非死即逃，无人耕作，就会使统治者的政权不巩固，剥削所得也有限。《汉书·食货志》中说西汉初期，皇帝的马车都无法使用清一色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全国人民的贫困也就可想而知。汉初统治者面对此种形势，总结秦王朝短

命的教训，不得不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力图恢复和发展。

从汉高祖刘邦到所谓“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大致采取了以下一些有效措施：用“和亲”政策延缓了与匈奴的战争；用少量分封诸侯王的办法争取原秦朝和六国旧贵族势力的暂时妥协；对农民减轻刑罚和赋税，促进人口增长，督促农业发展。实行这些措施，争取到全国基本稳定的政治局面，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文化方面，也改变秦朝的作法，先后废除了“谣言诽谤罪”和“挟书律”，大力征求天下图书，立博士传授经学，允许文人畅所欲言，议论政策问题，议论得好的还可以当官。实行上述措施的结果，到汉武帝时看得很清楚，汉朝国力达到极盛时期。《史记·平准书》中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时对匈奴分裂势力和封建诸侯王势力的战争也已经分别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前进了一步。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就从此时开始。近年来以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代表的各地一系列汉墓出土文物提供了实物证据，使我们得以具体看到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水平。

汉武帝在位的公元前一百年前后，既是西汉国力发展的顶点，又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点。汉武帝刘彻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不接受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多次发动大规模讨伐战争，修建千门万户的建章宫，大搞封禅泰山、寻求神仙等迷信活动，使全国人力物力大量消耗，影响了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他信用酷吏；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受

公孙弘、董仲舒的建议，立太学专门传授儒家经典，从此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儒家礼教从汉武帝时起，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思想意识的统治地位。自汉元帝刘奭以后，政治黑暗，西汉王朝迅速衰落。到公元九年王莽篡汉时，全国阶级矛盾已激化到爆发点，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终于使王莽的新朝也迅速垮台。

从公元二十五年至公元二二〇年为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靠收编农民起义队伍扩充实力，取得政权。他接受了西汉末年复亡的教训，也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如释放官私奴婢，减轻农民田租负担，兴修水利工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等，曾经维持了几十年所谓“中兴”的局面。东汉中叶，自殇帝刘隆以后又急剧走下坡路。当时皇帝一个个年幼而且短命，如殇帝生下来一百天就当皇帝，一岁死；冲帝两岁立，三岁死；质帝八岁立，九岁被毒死；少帝立一年就被董卓废掉并毒死。太后虽然可以摄政，代年幼的皇帝治理国家，但由于皇帝夭折，太后也往往是年轻妇女。这就造成宦官和外戚争夺实权的长期斗争。这一斗争成了东汉后期政治形势中的一大特点。

东汉时期太学生很多，在洛阳都城有三万多太学生，私人讲学所收的学生也往往超过千人，显示出当时教育事业规模不小。最初汉武帝立太学本意是教授儒家经典，培养后备官吏。到东汉时太学生太多，已经不可能人人做官。宦官、外戚却都不是靠经学训练而是靠接近皇室的关系做官。太学生和太学生出身的文职官员往往联合外戚对宦官进行斗争。这样曾经酿成两次“党锢之祸”，宦官利用手中的实权大规模屠杀文人，受株连者很多。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大大削弱了东汉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地方豪强、

军阀势力乘机纷纷扩张。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拖垮了东汉王朝，黄巾起义本身也失败了。代之而起的是各路军阀互相混战，到公元二二〇年才正式成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

东汉后期不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而且政策变动也很剧烈。自西汉后期以来形成的儒教独尊的局面有了改变，由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争夺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因而儒生也分裂为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今文学派以汉初以来经师传授的儒家经典为依据，实用主义地解释孔子的学说，大量引入谶纬迷信的成分，来为政治斗争服务。经学的古文学派则依据古文传钞的经典，特别是汉武帝末年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居从墙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等经典，用以反对今文学派的解释。在反对谶纬迷信方面古文学派固然是对的，但古文学派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不见得就是正统。他们作为依据的蝌蚪古文写成的经典同样有伪造的痕迹。这种各自标榜“孔门正宗”的学术兼政治斗争对汉代作家思想和作品的评价有关系，故在这里略为提及。

从西汉末至东汉，对“文学”的概念与先秦相比有了进展。先秦时期只要是书面写成的作品都可当文学来讲，因此算卦的书、政府文件、史官记载、诸子的学术等都是文学，都在文学史要讲的范围之内。从汉代开始，有了“文学”和“文章”的分类。“文学”一词沿袭了《论语》中孔门四科的分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本来文学泛指一切学术。汉朝人（以司马迁、班固、王充等为代表）从中分出“文章”一类。把一切讲解经典、学术的学者或著作叫文学；把作者独立创作出的作品叫文章。这个文章仍然包括很广，一切阐述自己学术主张的著作、表奏、书信等应用文、史传文、诗赋等都包括在内。我们讲汉代文学也就要随着文

学观念的演进阶段，确定要讲的对象。既不能用现代观点去排斥汉代政论、书信、史传等作品，又不能象先秦那样涉及范围过于宽泛。

以上就是汉代社会背景的大致轮廓，汉代文学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变化发展。为叙述方便起见，把两汉文学的发展状况按文体分类介绍。

一、汉代政论文：

汉初统一的形势使那种战国时代记录游说之词、一家之言的散文地位降低，逐渐失去市场，而关于如何巩固政权，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分析性质的政论文特别受到重视。统治者鼓励文人上疏谈政策问题，也用“策问”的方式考核，对策优秀者可以当官。在这种受鼓励、有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汉代政论文蓬勃发展起来。据严可均辑的《全汉文》统计，西汉文章家约有八百人。作品以写给皇帝看的奏疏为最多，写作的实用目的超过宣传的目的。因此，西汉初期的政论文一般都能畅所欲言，对社会现实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引古证今，条分缕析，详陈利害，而且往往能提出具体办法供天子采择。文章中用词比较尖锐，重说理而不大重文采，朴质而有气势。汉初政论文比较集中谈论的问题是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提出汉朝应采取的经济政策，建议削弱诸侯势力和对付匈奴骚扰等。代表作家有贾谊和晁错。西汉中后期的重要作品有桓宽整理的《盐铁论》。这本是汉昭帝时召集盐铁会议时的记录文件，桓宽经过整理加工，写成数万言的专著，分析探讨汉代经济政策的得失。全书用双方论辩的形式写成，其中的《本义》等是精采段落。

东汉的政论作家开始以论文集的形式写书，如王充的

《论衡》、王符《潜夫论》、崔实《政论》、仲长统《昌言》、桓谭《新论》都是由若干篇论文辑成的集子。文章是写给别的文人看而不单纯是给皇帝看的，又有点象一家之言了。如果联想到腐败的东汉统治者不准议论政策问题，在政治文化上的禁锢政策等情况，就可知道政论文的这个转变是社会条件在起作用。东汉文人专集虽然写出不少，却不大受重视，这些书很快都残缺佚失了。只有王充《论衡》保存比较完整，历来研究也较多。《论衡》在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对文学发展影响也大，这些以后再讲。

东汉重要散文家还有刘向和扬雄。刘向以编书整理为主，以后专门介绍。扬雄主要是拟作儒家经典，如模仿《易经》写成《太玄经》，模仿《论语》写成《法言》。这些书在学术上有一定价值，在文学史上影响不大。

思考题：

- 1、秦代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是什么？
- 2、西汉统治者哪些政策对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

第二讲 两汉文学概况(二)

二、汉赋的兴起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名称，最早见于荀子的《礼赋》、《智赋》、《云赋》、《蚕赋》、《箴赋》五篇。因为是说谜语，需要描述铺陈，所以是以咏物为主。有问答的形式、骈散结合的句式，这对汉赋文体形式上有一点影响。直接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上为汉赋开辟道路的是屈原的作品。班固《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一段话把荀子的《成相词》，屈原等人的楚辞作品都包括在赋里面不一定合适，但却可看出汉赋的渊源是楚辞。

汉赋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西汉初期几十年为第一阶段。文人写所谓“骚体赋”，意思是他们写的赋在思想感情和形式句法上都与《离骚》很接近。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就很象楚辞。因为它是汉代人写的，又标明是赋，作品中夹杂有散文句式，所以习惯上把它算作赋。到枚乘《七发》问世，终于使汉赋成为独立的文体，故一般认为《七发》标志着骚体赋向大赋转变的完成。第二阶段从汉武帝时起到东汉初年，是汉赋的全盛期。作为汉赋代表的大赋大量产生。大赋的特点是篇幅加长，有问答，四字句和六字句占优势但也夹杂着散文句式。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描

摹铺陈城市的繁华，宫殿园囿的雄伟，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山川形势等等。用华丽的词藻、夸张的手法，从不同角度多方描写。最后照例用几句劝谏的话作结束。据班固《两都赋》序中的记载，西汉大赋仅献给皇帝看的作品就有一千多篇。大赋作者既有专业作者，即“言语侍从之臣”，又有公卿大臣等业余作者。当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东汉有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等。第三阶段从东汉 中叶以下，大赋衰落，为抒情咏物小赋发达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与六朝小赋联系起来。小赋篇幅较短，描写抒情都比较集中，写作目的也从歌功颂德给皇帝看变为文人个人抒发情怀。其中有些好作品。这个转变大约可以从张衡算起。他既是大赋作家、又开始写些抒情咏物小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的代表作有《归田赋》、《思玄赋》、《髑髅赋》等。到东汉末期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和祢衡的《鹦鹉赋》则更进一步打破了汉大赋以歌功颂德为主的传统，开始有了对统治阶级讽刺、暴露、发泄不满情绪的内容。可惜这种作品太少，在汉赋中算不上主流，只是东汉末年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个别作品。

汉赋，特别是大赋兴盛的原因除文学发展本身的传统和创新关系外，主要是统一繁荣的社会条件、统治者的奖励和提倡、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发达等。汉代大赋僵化的形式，呆板的铺陈罗列的内容、生僻字词的堆砌、题材和写作目标的狭隘使它的作用和影响受到很大限制，思想性艺术性成就就不大。汉赋尽管盛极一时，它的衰落也很彻底。

三、汉乐府与五言诗：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有专管音乐事务的官员和机构。据《周礼》记载，春官大宗伯的属官有大司乐、乐师等官员。西汉初有太乐官。《汉书·礼乐志》有“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的说法，这个乐府令只能看作官名。汉武帝成立了大规模的乐府机关，成员达八百多人。任务是“采诗夜诵”即搜集民歌练习演唱。还命令文人作词，由乐府的协律都尉配曲。另外还继承古代雅乐，在庙堂宫庭仪式上演出。从规模上、对民歌与文人诗歌的影响上看，说乐府起于汉武帝时是正确的。

乐府本是音乐机关的名称。由于它搜集整理了大量民歌，也保存和传播了文人模拟民歌的作品，因而后来称那些作品叫“乐府诗”，简称“乐府”。东汉以后，又把那些没有经过乐府机关之手，但用了乐府古题写的诗也称为乐府。唐代新乐府运动仅继承乐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讽谏时事的传统，也叫乐府。元、明、清时期更有把所有可以入乐的诗、词、小曲都称为乐府的。总的趋势是“乐府”一词的含义愈向后发展包括的范围愈宽泛。文学史上所说的汉乐府就是指经乐府机关整理过的乐府歌诗。

汉代民歌经乐府机关的提倡、搜集整理和传播，大大影响了文人创作，使濒临僵化境地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新的生机。到公元前四年、汉哀帝因为不喜欢乐府民歌，曾经把乐府成员裁减一半，剩四百多人，搜集民歌的工作也放松了，但一百多年的提倡已见成效，流散在外的乐工还在传唱，私家搜集和文人创作也在逐渐增多，因此现存的汉乐府民歌反而是东汉时期的较多。乐府诗的强大生命力于此可见一斑。

现存的汉乐府诗明显地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所作的庙堂宫庭仪式上用的歌词，完全遵循《诗经》中雅颂的传统，基本上用四言体，内容是歌功颂德，用途是用于各种典礼场合，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高。另一类是来源于民歌或文人拟作民歌的作品。这些作品除少数杂言体的以外，基本都是五言体，紧密联系当时的现实生活，有不少好作品。

汉代乐府民歌最盛行的时期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初期。在乐府民歌五言占优势的情况下，文人逐步由拟作乐府民歌到创作独立的五言体诗也大约从这时开始。五言诗的起源如果找个别例子，可以早到汉代以前，但独立成为一体并流行起来却只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才成功的。在汉乐府兴盛以前文人五言诗并未成形，旧有的一些所谓早期五言诗的时代和作者，经历来研究，也都一一否定了。如《古诗十九首》中有八首曾被陈朝徐陵指为枚乘所作，但梁朝昭明太子却没说是枚乘的作品，钟嵘、刘勰也都怀疑。又如“苏李诗”即李陵苏武赠答诗，也是后人伪托的，证明西汉前期没有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西汉只有民歌民谣有比较成熟的五言形式。李延年《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李延年是汉武帝时的协律都尉，专在乐府中整理民歌和为文人歌词谱曲。他是受民歌影响较早较深的。即使如此，他的《佳人歌》也还有一句不是五言。

还有一个现象，即有些作品如《古诗十九首》、《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在古籍记载中有的标明是古诗，有的标明为乐府，五言古诗和乐府纠缠不清，恰好证明五言诗的产生和乐府很有关系。

文人五言诗较好的作品产生在东汉。班固《咏史诗》还

显得不够成熟。《古诗十九首》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但大致可以定为东汉时若干无名氏的作品。它的思想性比起乐府民歌来显得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但艺术性历来评价很高，是一些成熟的抒情诗。《苏李赠答诗》虽然不是苏武、李陵的作品，但假托者也大概是东汉诗人，作品写得很成熟，思想情调也接近《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和五言古诗大都为抒情诗，其中有少量叙事的如《陌上桑》、《羽林郎》、《十五从军征》等叙事也很简单。到汉末建安年间出现的《孔雀东南飞》是著名长篇叙事诗，可称为汉乐府或五言古诗的优秀代表作。

四、传记文学：

传记体文学作品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汉以前，传记文学还默默无闻。到西汉，司马迁创立了用人物传记为主体叙述历史的方法，其客观作用之一就是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班固继承司马迁的办法，仿照《史记》写了《汉书》，也同样有若干优秀的传记作品。司马迁和《史记》以后再讲，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班固和《汉书》。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文史还不分家，现在讲《汉书》也可以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讲。班固（32—92年）字孟坚。他父亲班彪字叔皮，是东汉初年有名的学者，也是一生有志于写作历史书的史学家。他原计划接着《史记》续后传，但未能完成，只是给班固写作《汉书》奠定了基础。班固在他父亲的影响、教育下也一直留心汉代的历史资料。在班彪死后，班固决心完成《汉书》，就于公元五十八年着手写《汉书》。写作不久，有人告发他私自乱写国家历史，使他被捕